

對蘇堂棟教授的簡短回應

科大衛 劉志偉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蘇堂棟教授就我們發表在上一期學刊的文章作出積極的回應。但令人遺憾的是，蘇堂棟先生的回應對我們的文章甚至對我們以往的研究有非常多的誤讀以至曲解，給我們扣了很多帽子。在這裡，我們不想對那些充滿了誤解的批評逐點作出回應，也不打算對蘇先生曲解我們的觀點一一作出申辯。我們與蘇先生的分歧，並不在於是否認識到地方利益驅動下的民間文化多元性再創造，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不言而喻的，是我們過去三十年所從事研究的基本出發點。我們與蘇先生最根本的分歧在於：他以為，學者以觀察者的立場可以客觀地分辨正統／非正統或標準／不標準的行為；我們則認為，觀察者對這些分別的理解，與當事者的理解往往有很大的距離。研究者既要從地方性策略以及來自民間的多元化創造去認識中國，就不應該從學者認定的正統性標準出發去認識地方社會的歷史。

早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已經知道，在地方社會，被當事人標榜合乎正統規範的表現，與觀察者所認識的國家正統標準可以截然不同。如果我們今天的研究，還停留在只是注意並指出地方社會的文化表現與王朝國家正統規範之間存在分歧，而不能試圖對這種分歧作更具歷史深度的解讀，那就只是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上原地踏步。

我們相信，在歷史上不同的時候，王朝禮儀的改變和對民間禮儀的規範，在很多方面都會得到地方上的響應。但是，對地方禮儀有影響的力量，並不只來源於國家。我們的文章強調了師承和文字對禮儀的影響力，而地方對這些力量的反應，也不一定相同，所以地方社會的禮儀也就不一定要與王朝國家的規範相一致。無論地方上可以觀察的禮儀行為與正統的規範相同或不相同，當事人還是可以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表達對文化大一統的認同或抗拒。

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新界沙田，電郵：davidf@arts.cuhk.edu.hk；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郵政編號：510275，電郵：hsslzw@mail.sysu.edu.cn。

我們自己的研究，是從華德英有關意識形態的文章出發的。我們希望蘇堂棟先生能夠再仔細讀讀她的文章，也讀讀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來用英文和中文發表的論著，看看有沒有理由可以由此引出「科、劉則相信一切都指向中央」的結論。由華德英的文章出發，我們在過去三十年的研究得到的認識是：在不同的地方，民間社會所行禮儀有異有同，有似同非同，也有似異實同。種種形式，當然可以來自不同的傳統。其中鄉民們相信屬於「正統」標籤，可以出自一個盛載着不同禮儀規範要求的籃子；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朝代，由不同師承傳統的禮儀專家，以不同的方式往這個籃子裝進了不同的內容。地方社會同國家拉上關係的時候，往往因應本地的處境，從這個籃子中選取不同的內容，創造鄉民們認定為「中國的」禮儀傳統。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間，不同的「國家」對禮儀的要求可以一再改變，而地方社會則可以把整個籃子認定為大一統的「中國」。在我們的觀念中，文化大一統的「中國」當然存在分歧，也一定要存有分歧，然而，這種分歧的存在，並不影響當事人對大一統的信念。

關於我們對《華琛專號》五篇文章的批評，由於蘇先生給我們扣了很多帽子，我們希望容許在這裡簡單重申一下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彭慕蘭的論點與華琛並沒有什麼分別。鮑梅立的討論，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是無關宏旨的；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們認為土家族的研究不重要，而是鮑文對土家族研究得到的經驗，不在華琛論文討論的範圍內。我們對宋怡明文章中提出的「偽標準化」概念的質疑，是要強調不能以標準化是否可以有真偽之分，來否定民間對大一統概念的確信。對於康豹的文章，我們以為過分強調了在大一統的創造中禮儀專家與國家在角色上的分歧。至於蘇堂棟先生的文章，我們認為與華琛文相對比，其區別頗類似士大夫引經據典的高論與村民從經驗出發所作出的回應。

最後希望強調一點，我們的討論既沒有要同華琛商榷的用意，更沒有要為華琛辯護的目的。我們同意蘇先生回應文章所說，在很多具體的論點和立場上，我們同《華琛專號》文章的作者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分歧，我們只是希望指出，《華琛專號》中的文章在學術上表現出一種走回頭路的傾向，故有必要提出來討論。